

鼓起干劲 力争上游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目 录

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各地区各方面普遍推行 种試驗田的經驗通知	1
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员会 关于各級干部种試驗田的报告	2
种試驗田——又紅又專的道路	“人民日报”社論 9
一次爭取大跃进的大会	“人民日报”社論 16
鼓起干劲，力爭上游	“人民日报”社論 20
要跃进就得苦干	“新华日报”社論 25
发动群众打破陈規	“人民日报”社論 33
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	“人民日报”社論 36
充分发挥青年在革命中的促进作用	“人民日报”社論 41
从梅林看全国	“人民日报”社論 45
我們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儉建国	“人民日报”社論 48
打掉官气、暮气、闊气、驕气和嬌气	习仲勳 54
在国家机关中反掉一切浪费現象	“人民日报”社論 56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除四害講卫生的指示	59
一定要在全中国除尽“四害”	“人民日报”社論 65



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各地区

各方面普遍推行种試驗田的經驗的通知

中共中央决定把湖北省委关于各級干部种試驗田的报告在报纸上公布，并且要求全党各級組織加以討論，根据这个經驗改变自己的领导作风。

这个报告是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写的，說的也只是同时种試驗田的若干县中的一个县即紅安县的經驗。现在种試驗田的方法在湖北省已經比較盛行，其他省也有一些地方开始推广这个方法，某些工业企业中的干部也开始学习类似的工作方法。但是从整个来看，这个方法还远远沒有在全国普及，全党認真討論一次紅安县的經驗还有重大的迫切的意义。种試驗田是一种彻底克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方法。它可以打掉官风，使干部真正到群众中間去领导群众。它可以使干部走上“又紅又專”的道路，实现政治和技术的統一。我們全党的干部必須实现政治和技术的統一，既不要作迷失方向的实际家，又不要作空头政治家。因此，在全国各地区各方面普遍推行种試驗田的經驗，是完成党的整风任务的基本关键之一。除了从事农业工作的干部應該普遍种試驗田以外，从事工业工作、交通运输工作、財政貿易工作、文化教育工作以及其他领导工作的同志，也應該認真研究种試驗田的方法，联系本身工作特点，得出必要結論，以便打掉官风，逐步达到又紅又專的目的。

中 共 中 央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四日

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员会 关于各级干部种試驗田的报告

中央并各地、县委：

从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以后，我省农村干部的思想作风有了显著的转变。这个转变，和干部下放、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亲自动手种試驗田有密切的关系。干部种試驗田，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造，这对于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实现党对农业生产的具体领导，起着决定的作用。最近我省各县已经普遍地推行了这个办法，许多县在这方面有了显著的成效，开始从根本上改变着农村工作的面貌。以红安县为例：该县共有县、区、乡、社四级干部一千四百七十名，亲自动手搞試驗田的有一千一百五十一名。其中有县委委员十四名，区委书记（指导组长）十七名，乡支部书记四十五名，社主任六百三十二名；共种了水稻試驗田六百四十六亩，花生試驗地四百七十六亩，还有棉花、红苕等作物的試驗地。这些試驗田的产量，都高于合作社一般田地的产量。县委委员、副县长萧林山培育的兩亩水稻試驗田，获得了亩产水稻千斤的丰收纪录。七里区区委书记王作中的一亩花生試驗地获得亩产一千一百九十斤的纪录。此外，还有皮棉亩产一百斤，红苕亩产一万斤的丰产纪录。在試驗田的推动和影响之下，实现了大面积丰产。全县有三百一十三个粮食亩产一千斤的社，一百二十八个花生亩产八百斤的社，二十一个皮棉亩产一百斤的社。全县十五种农作物样样丰收，全县七百三十二个合作社，社社增产。全县粮食平均亩产八百零八斤，提前十年达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所规定的指标。据红安县委报告，红安县各级领导干部亲自动手搞試驗田的经过情形是这样：

“四多”和“三願三不願”

1956年冬季以前，在縣級機關里，流傳着“四多”、“三願三不願”的說法。所謂“四多”，就是“騎自行車的多，打籃球的多，穿大衣的多，吃食堂的多”。所謂“三願三不願”就是“願坐在屋裏開會辦公，不願下鄉領導生產；願到先進社，不願到落後社；願和鄉、社幹部打交道，不願做深入的羣眾工作。”縣委委員十八人，經常下鄉的只有三人，至多不過七人。有些縣級機關的領導幹部，缺乏面向農村為農民服務的观点，按時上班，照例休假，給農民增加了許多麻煩和不便，農民羣眾很不滿意。例如兩道鄉鄉長為了到縣郵政局交涉架設電話綫的問題，在外邊等了個把鐘頭，無人理會，說是“沒有時間”，等到“有時間”，又說，“下班了”，鄉長很是惱火。所以，在以後，郵局幹部到兩道鄉去找他了解有關業務情況的時候，他也說，“沒有時間”。郵局幹部等了一會又找他，他也說，“我下班了！”兩道鄉鄉長的這種戲劇性的報復行為，反映了農民對於縣級機關的官僚主義作風的不滿情緒。有些縣級機關的領導幹部不願下鄉，有的甚至即使“被迫”下鄉，也是“人在鄉下，心在城里”。例如稅務局局長張福下鄉才三天，就向鄉幹部說，“我要回到城里去剃頭。”鄉幹部說，“我們給你找個好剃頭師傅。”他說，“我要回到城里去洗澡。”鄉幹部說，“我們給你找個好洗澡盆。”他說，“我要回到城里去換衣服。”……就這樣，騎着自行車溜回去了。由於上面領導的不深入，不具體，下面幹部也照樣學。从上到下，都習慣於用“開會”的辦法解決問題。“會議多”的現象又出現了。永何鄉支部書記陳開和一個月開了二十八天的會，影響得那個鄉的勞動出勤率只達到60%。許多幹部不安心農村工作，認為在農村工作“沒有前途”，因而在工作中深入不下去。金牛區的工作員張漢興，工作消極，好吃、好穿、好玩、好睡，在南台鄉工作九個月，住了十四個社，社社都不歡迎他。前程社社員給他編了一首順口溜：“張漢興，不

成人，白天光睡覺，夜晚熬死人。”許多合作社無人過問。桐柏鄉聯盟二社連年減產，該社駐社幹部副區長韓維，就是一個所謂“挂名辦社”的人。1956年這一年，是合作化的第一年，大家都缺乏辦社經驗，這是事實。但是，領導的不深入，不具體，一部分幹部不安心農村工作，不熱心辦社，也是事實。因此，這一年，全縣的合作社當中，減產社占10.7%，增產很少（5%—10%）的社占30%。

下放幹部，表揚模範

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提倡艱苦奮鬥的精神的教育和鼓舞之下，縣委採取了一系列的有力的措施，改善領導，改進工作。主要的措施是精簡上層，下放幹部。派了十五個較強的區委幹部，擔任了十五個落後鄉的總支書記，派了一百九十五個較強的區鄉幹部，擔任了一百七十六個落後社的領導幹部，並且採取了層層下放，長期固定在一个社里包工包產的辦法。抽調了一百七十六名優秀的機關幹部和八十七名鄉幹部，加強社的領導，又抽調了一千二百四十名社幹部加強生產隊的領導。對於所有下放到鄉、社、隊的幹部，提出了長期負責到底的要求。鑒於有些幹部是“人下放了，思想還沒有下放”的情況，在全體幹部中發動了一次對於先進人物模範事迹的討論。這些先進人物如要求下放，回鄉積極辦社的鄉總支書記黎海清；大公無私，舍己為社的社主任江藤榮；大膽革新，不怕困難的社主任辛時龍；艱苦辦社，變落後社為先進社的鄉長汪遵湯；艱苦深入，團結幫助鄉幹部的機關下放幹部叶敦文；模範烈士家屬徐大媽等同志的模範事迹，對於廣大幹部，起了深刻的教育作用。例如原來對於“下放”頗有抵牾的下放幹部陳洪國在參加了這次討論之後，檢討了自己的錯誤思想，決心在十里鄉中心社干一輩子。經過幹部下放和開展了這次討論之後，不僅社社有人負責，而且大大地激發了幹部辦合作社的積極性和責任感。古店鄉支部副書記黃成中過去東跑西走，早出晚歸。自從固定駐社以後，三個月沒有回

家一次。社員說他“去年当老婆的卫士，今年做了人民的勤务員”。

参加生产，领导生产

在干部下放的同时，县委強調了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县委十八个委員中，經常下乡的十四人，县級机关干部，輪流下乡，短期下放，县委办公室也搬到重点乡去了。但是，有些同志虽然下了乡，工作还是深入不下去。曾經三次申請調离农村的高桥区指导組長王树昌和农場乡支部書記邓开志，穿着鞋袜，在田岸上“检查生产”，一个社員对他倆大声叫罵：“娘卖瘟的，搖搖擺擺，象个相公（少爷），莫把我們的田埂子躁塌了！”王树昌問：“你罵誰？”那个社員說，“我罵你！”王树昌把这个情况向当时在乡下工作的县委副書記張景田同志反映。張景田同志說，“罵的对！这是因为我們沒有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張景田同志向这区的干部講了这件事，号召这个区的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他本人帶头花了一块多錢买了一把鋤头。在他的影响下，全区干部每人都买了一把鋤头。不久，全县农村干部一万零九百二十五人中，有97%的人自备了鋤头、镰刀和劳动手册，参加了生产。县委組織部長潘知在八里乡万兴社白天帮助社里犁田、送粪，夜里帮助社里搞包工包产。社員夸奖他是“文武双全”。广大干部参加生产之后，和农民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对于当时生产起了推动作用。但是，也帶來了新的問題：干部在参加社的生产的时候，往往被分派到和妇女、小孩在一块干些輕活，不容易了解情况，发现問題。有的干部虽然担任了主要劳动，也是由于成天参加生产，忽視了领导生产，不了解全面情况，就很难系統地总结經驗，指导全面。例如張店乡副乡長熊傳毓在星光社干了三天农活，开会时，一点情况也談不出来。他很苦惱地說：“这是搞的么名堂，累的腰酸背脹，工作还没有做好！”差不多有半个月的时间，許多干部都有着熊傳毓的那种苦惱。看来光是一个人一把鋤头，参加生产，还很难达到领导生产的目的。怎么办呢？

种了試驗田，實現了具体領導

县委第一書記程鵬和农村工作部長庫崇德在县委重点乡杏花乡建苏社摸索到了一条經驗，这就是用領導干部亲自动手种試驗田的办法，可以更好地做到参加生产、領導生产。

1957年3月間，正是花生播种的时候，程鵬和区技术站長祝翼宏一块在建苏社五峯崗生产队选择了一亩地作为花生試驗地，吸收了這個生产队的技术員秦老五和对于花生生产有經驗的富裕中农秦必权参加了試驗地工作。程鵬依靠这些技术干部和有經驗的农民，在这块試驗地上亲自試驗，認真研究，做出了活的榜样。例如在花生播种的时候，当地的习惯是不上底肥，說什么“花生不要肥”。程鵬問秦必权“怎么办？”秦說，他过去是看田施肥，不光施水粪，还有草木灰。程鵬問祝翼宏“对不对？”祝翼宏說，对，不仅要氮肥，还要磷肥。商量的結果，就决定要施底肥。当地的习惯，下种只下一粒米或者兩粒米。秦必权說，他下过三粒米，增加了生产。技术干部也主張三粒米。商量的結果，就决定下三粒米。当地的习惯是白子下地，技术干部主張根瘤菌拌种。有人誤以为这是藥怕爛了种。經过程鵬和技术干部解釋說，这是一种施肥的方法，于是，就决定用根瘤菌拌种。当地的习惯，花生不密植，程鵬和祝翼宏、秦必权、秦老五等商量，可以实行7×8寸密植。照上面說的办法播种之后，花生苗長的很好。

又如，在花生薅草的时候，当地的习惯只薅一兩道草。程鵬訪問了有經驗的农民，他們說了三句順口溜，总结了花生薅草的經驗，这就是“头草刮（即薅的淺），二草挖（即薅的深），三、四道草如綉花（即薅的細）”。并且說，在薅二道草的时候，要結合培土壅兜。商量的結果，决定这样做了，花生苗越長越好。

又如，在抗旱的时候，有人說，“自古以来受了干的花生苗不能澆水，一澆水就要瘁死。”程鵬和他的助手們研究的結果，受丁

干的花生苗一样可以澆水。办法是早晚澆，不会“瘁死”。商量的結果，这样做了，战胜了大旱。

有了这些活的榜样，就召开現場會議，进行参观評比辯論和总结。程鵬就是这样在花生的播种到收获的全部过程中，依靠自己亲身参加的这块試驗地，对于全县的花生生产实现了具体领导。其他县委委員和区、乡、社领导干部也都是通过試驗田来实现对生产的具体领导。

领导和羣众相結合的鑰匙

各級领导干部亲自种試驗田的方法，是最有力量的說服和示范的方法，这种方法的根本特点就是领导干部、技术人員和农民羣众三者相結合，对于领导干部、技术人員和农民羣众本身都有莫大的好处。对于领导干部来說，通过种試驗田，找到了领导和羣众相結合的鑰匙，找到了打破保守思想，推广先进經驗，实行以点帶面，点面結合的武器，打开了如何对农业生产实现全面的、深入的、具体的领导的“悶葫蘆”，及时地了解了情况，发现了問題，傾听了羣众的呼声，集中了羣众的智慧，可以有效地避免或者减少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更好地貫徹执行羣众路綫的工作方法。对于技术干部来說，得到了领导和羣众的支持，提高了鑽研技术的积极性，向领导干部学习了羣众运动的經驗，向农民羣众学习了生动活潑的生产經驗，既提高了政治思想水平，又提高了技术、业务水平。对于农民羣众来說，最切身的实惠是增加了生产，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从而更加發揮了集体劳动的积极性和創造性。上面說的这些好处，是领导干部、技术人員、农民羣众三者相結合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試驗田的方法，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提高。现在試驗田已經普遍到各个社和生产队，并且出现了大批的丰产田。

訓練了嶄新的技術隊伍

各級領導幹部親自搞試驗田的方法，是訓練嶄新的技術隊伍的有效方法。紅安縣的縣、區、鄉三級幹部七百六十六人（其中有知識分子幹部一百二十二）中，學會了耕田、耙田、防治蟲害、選種、拌種、掌握農業季節、栽秧、鋤草的幹部由1956年的13%，增加到1957年的66.2%。各級領導幹部大部分都學會了基本的生產技術。這不僅對於加強生產的具體領導有決定意義，而且對於培養嶄新的技術隊伍也有決定意義。各級領導幹部親自種試驗田，在做的當中，得到教訓，提高了覺悟，轉變了作風，增長了才幹，更進一步獲得了群眾的愛戴和支持。以前到處不受歡迎，被社員諷刺為“不成人”的張漢興，在親自搞了試驗田之後，改變了社員對他的看法。社員們說，“張同志在我們社里幹一輩子，我們也歡喜。”以前不安心農村工作，被社員諷刺為“洋蔥”的知識分子龔全安，在種了試驗田，得到群眾的表揚以後感慨地說：“出了家門進學門，出了學門進機關，出了機關進社門，談起生產是黑門。種了試驗田，生產入了門。”以前在田岸上檢查生產，挨了罵，被社員諷刺為“檢查官”的指導組長王樹昌，現在被群眾呼為“技術員”了。親自搞了試驗田的幹部都有這樣的體會，從頭到尾具體地熟悉了農作物的生產過程，學到了許多極為有用的生產知識，感到對於農業生產的領導，有興趣，有勁頭，有把握了。對於勤勞勇敢的農民群眾的感情更加深厚了，對於農村的一切，特別是對於農作物的生長，也發生了感情。八里鄉指導組長阮觀陞在縣里開完抗旱緊急會議以後，時間已是下午了，他趕了七十里路，回到自己所在的社，連門也不進，就趕到田里去看庄稼。沒有月光，沒有星光，也沒有手電，就伏到田埂上用手去摸田里有沒有水，他生怕田里的稻苗乾死了。紅安縣的廣大幹部由“人在鄉下，心在城里”轉變為“人在城里，心在鄉下”和“人在社里，心在田里”了。當然，這些和農民、和土地、和農作物、和農村的一切

发生了感情的干部，现在不仅非常安心农村工作，而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劲头正在越来越大。他们和群众商量的结果，满怀信心地制订了1958年的生产规划，要求1958年全县的粮食和花生的每亩产量都达到九百斤，争取达到一千斤，棉花每亩的产量达到一百斤；要求全县粮食的总产量比1957年增长20%以上，花生的总产量比1957年增长50%以上，棉花的总产量比1957年增长50%。

这就是红安县的各級领导干部亲自动手种試驗田的经过情形。麻城、孝感等县的情形基本上也是这样。红安县委对于这个问题已经进行了一次总结。省委要求各地委、县委也像红安县委一样，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一次检查和总结，要求他们学习红安县委改变领导方法，转变干部作风，派干部加强落后乡、落后社、落后队的领导，争取社社增产，各种作物样样丰收的经验，特别是要把领导干部亲自种試驗田的方法坚持到底地干下去。总之，领导要带头，革新先試驗。干劲加办法，跃进定实现。

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請中央指示。

中共湖北省委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原載1958年2月15日“人民日报”，文內小插題是“人民日报”編輯部加的)

种試驗田——又紅又专的道路

1958年2月15日“人民日报”社論

湖北省红安县高桥区的指导组长王树昌和农場乡支部書記邓开志，有一次穿着鞋袜在田岸上“检查生产”，一位社員对着他們大罵：“搖搖摆摆，象个相公(意即少爷)，不要把我們的田埂子蹀塌了！”王树昌問他：“你罵誰？”那位社員說：“我罵你！”王树昌把这个情况告訴当时下乡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張景田同志，張景田同志

說，“罵的對：這是因為我們沒有參加生產、領導生產。”

是的，罵的對。“搖搖擺擺，象個相公”，這是農民對那些不能具體領導他們生產、只會站在旁邊指手劃腳的干部的公正的評語。現在，王樹昌同志已經被農民們親熱地稱呼為“技術員”而不是“檢查官”了，因為他和紅安縣的其他許多干部一樣，親自動手同技術人員和老農一道，種“試驗田”，具體領導生產了。但是，在全國各地，在各行各業，從一般干部到高級的領導干部，不是還有許多人在“搖搖擺擺”嗎？

說“搖搖擺擺”，對於我們許多同志來說是不舒服的，難堪的，但却是事實。我們有些干部，只願在機關里辦公，不願到下层去，高高在上，脫離群眾。有些人即使到了下层，但仍然人到心不到，仍然是擺架子，指手劃腳。對於這樣的干部，首先必須打掉搖搖擺擺的官風。不把官風打掉，我們就不可能象黨中央和毛主席經常教導的那樣，成為人民群众的親密朋友，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群眾也就不会真正把我們當成自己人，當成他們建設幸福生活的組織者和領導者。

領導干部走出辦公室，放下架子，和農民一樣自己動手種庄稼，種試驗田或者叫做試驗地，是打掉官風的最有效辦法。這是領導作風上的革命，具有極其重大的歷史意義。紅安縣的許多干部，以前曾經是不願下鄉，不願下田，人在鄉下，心在城里，而在一年以來，經過種試驗田和其他一系列的措施，風氣却完全改變了，變得人在城里，心在鄉下，人在社里，心在田里。這就是說，他們的思想感情，真正成為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了，他們和廣大群眾的精神隔閡消除了。幾千年來，在舊社會中，當官的人都把勞動看成卑下的事情，我們要用自己的行動來告訴人民：勞動是光榮的事業。舊社會當官的都把自己看得比勞動者高一頭，我們要用自己的行動告訴人民：我們是和勞動者完全一樣、完全平等的人。

走出辦公室，種試驗田，不僅是領導作風的轉變，而且是領導

方法的新創造。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我們共產黨人無論進行何項工作，有兩個方法是必須採用的，一是一般和個別相結合，二是領導和群眾相結合。”紅安縣領導幹部通過試驗，以自己的直接的實踐，創造典型經驗，用這個經驗去領導和推動廣泛的群眾性的生產運動。這就一舉而解決了個別與一般相結合和領導與群眾相結合這兩大問題。目前還有許多地方對生產的領導一般化，缺少深入的具體的指導，沒有創造和利用典型經驗，以推進全盤工作。在這樣的地方，提倡領導幹部同技術人員、有經驗的農民合作種試驗田，更有特別重大的意義。要知道只有深入下去，突破一點，才能創造和總結出具體的生動的經驗，更有成效地指導一般地區的工作。今天，生產的規模日益擴大，生產內容日益複雜，生產技術需要步步革新。空洞的一般化的領導，不僅不能推進生產，有時候甚至會阻礙生產的發展。要改變這種情況，必須積極推廣紅安等地的領導方法。

紅安縣領導幹部自己動手種試驗田，是一個很好的領導方法，但它的意義遠不止於一般的領導方法的改進，它還有更重要的更根本的意義。這是關係到在新形勢下我們廣大幹部的努力方向的問題。

我們的幹部隊伍中，有許多同志曾經歷了革命烽火的鍛煉，有比較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對社會主義事業是忠心耿耿的，也有領導群眾進行階級鬥爭的經驗。他們大都在各個不同崗位上負擔領導的責任，繼續領導着階級鬥爭，同時領導着偉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事業。目前我國人民在一方面還需要繼續進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者和反革命分子的鬥爭，在政治戰綫和思想戰綫上還需要繼續完成社會主義革命，並且還需要最後完成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這些都屬於階級鬥爭的範圍；但是在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卻愈來愈成為我國人民的中心任務。我們還需要作艱巨的奮鬥，才能把我國建設成為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強國。隨着時間的推移，我們的領導幹部

熟悉的階級鬥爭的本領，有些快要閑起來了，而我們不熟悉的向自然界進行鬥爭的本領，則需要加緊學習。現在我們國家所急切需要的領導幹部，就是完全忠實於社會主義事業而又具有充分的業務知識來組織和指導社會主義建設的人，也就是說，需要“又紅又專”的領導幹部。紅就是共產主義的思想和政治，專就是專門的業務和技術。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是一切業務和技術的保證。不問政治，就會成為迷失方向的“實際家”。反之，如果完全不懂業務，沒有相當的技術知識，也就會成為“空頭政治家”，不能在實際上領導和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沒有一個強大的又紅又專的幹部隊伍，就決不可能完成社會主義事業。我們共產黨人曾經用堅忍不拔的努力學會了階級鬥爭的本領，因此把強大的敵人打敗了；現在，我們同樣要用堅忍不拔的努力學會向自然界作鬥爭的本領，學會搞經濟、搞建設，學會各方面工作所需要的技術和知識，由外行學成內行。這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目前所面對着的嚴重的歷史性的任務。

領導幹部種試驗田的重大的原則意義，在於這是我們許多領導幹部走向又紅又專的道路。種試驗田，將使領導農業生產的同志們真正取得農業生產的技術和知識，成為農業生產的內行，使他們能夠成功地領導農業生產的大躍進。這條道路，不僅是領導農業生產的同志的道路，而且也是所有做領導工作的同志達到又紅又專的道路。毛澤東同志在“實踐論”中說：“你要有知識，你就得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在我們幾十年來的革命鬥爭中，那一件成功的事情不是我們的領導幹部親身參加的呢？領導階級鬥爭需要這樣，領導生產鬥爭同樣需要這樣。領導幹部種試驗田，不僅可以獲得生產知識，使領導工作更加切合實際需要，大大減少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的毛病，而且可以大大提高增加生產的勇氣和信心。現在有許多地區和許多部門的工作，突飛猛進，一日千里，原因多半是因為領導幹部開始真正鑽業務了，能夠在業務上開始切實地領導工作了，

但是也还有許多同志并没有真正鑽进去，老是在門外徘徊；或者是稍微学得一点，就自以为已經成了內行，不願再深入学习。这样，他們的工作就进展很慢，老是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这些同志如果不痛切猛省，奋起直追，时代就会把他們远远抛在后面，他們原有的紅色也就会慢慢淡下去。

为了把种試驗田的方法推广到全国一切农村工作者中去，并且进一步推广到其他一切部門的领导工作者中去，还需要各地方各方面的同志进行创造性的努力。我們希望所有工矿企业的领导干部，以及交通、財貿、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的领导干部，都能走出办公室，深入下县，都来仿效种試驗田的办法，同劳动群众和技术專家密切結合，認真学习必要的业务知識和技术知識，成为自己行业的无产阶级專家，从而为我們党和国家迅速地建立起一支強大的又紅又專的干部队伍。

大轉变和大跃进

中共湖北省委第一書記 王任重

1957年是紅安县干部作风大轉变的一年。干部作风的大轉变；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大跃进。1957年紅安县遭受到相当严重的干旱；但是全县粮食的总产量却比丰收的1956年增加了十分之二，达到了亩产粮食八百斤以上。花生产量平均每亩六百斤，比1956年增加26%。各項副业收入比1956年增加140%还多。除了各种农作物以外，猪、牛、羊、鷄、鴨、魚、桑都增加了不少。紅安县的人民說1957年是“样样丰收、社社增产”，“五谷丰登”，“五色鮮明”；人們歌頌丰收的景象，“稻谷似黄金，花生滿畝青，棉花如雪白，社員滿面紅”，“样样丰收，社社增产”，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胜利。紅安县实践的經驗表明，采取全面规划、分作物負責的办法，抓住粮、棉、油

增产为重点，同时可以使山林水产和各项副业得到迅速的发展。采取抓两头带动一般的方法，可以消灭落后乡，落后社，落后队，从而消灭减产社，达到社社增产的要求。

紅安县委在1956年冬季，根据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关于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指示，从打击歪风邪气（当时在部分干部中滋长着贪图享乐、好逸恶劳的资产阶级思想），整顿干部思想入手，采取了精简上层、下放干部、加强落后乡、落后社、领导干部分作物与分片固定负责的办法，扭转了领导干部坐机关和跑来跑去、不深入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根据党中央关于领导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指示，紅安县委的主要负责干部首先带头参加了生产。在参加生产的过程中，摸索到搞试验田是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最好方法。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当地农民中的生产能手三者合作搞试验田，把经过试验得到成功的经验，让全县有关的干部来参观，并召开现场会议。这样既能防止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又能比较容易比较迅速地推广先进经验。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紅安县不仅在农业生产上取得了丰收，在干部思想作风、工作能力的提高上同样得到了丰收。广大干部因搞试验田而学到了生产的本领，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爱戴。对于群众，对于田地、对于庄稼都发生了浓厚的感情。从“人在乡下心在城里”转变成“人在城里，心在乡下”，“身在社里心在田里”了。那些官气十足的人，曾经被群众讽刺为“检察官”，“摆来摆去像个相公”；在切实改变了作风以后，被群众称赞为技术员和人民的好勤务员。紅安县委书记、县长和其他负责干部，都是亲自带头搞试验田，参加生产，领导生产。七里镇的群众说：“张书记（张景田）真像个庄稼汉，书记带头揀粪，我们的肥料不为难；书记带头种地，我们更不愁增产”。

紅安县委没有满足于过去的成就，他们提出了1958年的奋斗目标：“样样要试验，事事要革新，生产大跃进，实现双千斤”（指每亩水田产粮食一千斤，每亩花生生产一千斤）。根据这个方针和任务，

县委首先把干部培育試驗田的經驗加以总结推广和发展。自从去年冬播以来，县委二十三个委员人人都有了試驗田，其他机关干部和区乡干部、中小学教員大部分人都培育了試驗田。县委对农村工作的干部要求：“一人兩亩地，糧油三千斤（每亩平均要收粮食和花生一千五百斤），积肥四百担，劳动五百分。”县委决定把培育試驗田作为鍛煉干部，提高干部的思想觉悟，学习生产技术，达到“又紅又專”的一种經常化的制度。現在紅安县干部培育的試驗田，已經与合作社群众培育的大面积丰产田結合起来了。干部和干部，群众和干部互相比賽，培育丰产田的热潮已經开展起来了。絕大多数合作社建立了技术委员会，絕大多数社、队的干部都搞了試驗田。七里区在十五个区乡干部的帶动下，沿潘阳河兩岸，合作社联合培育了一个二千五百亩的丰产畷。在干部中出現了“苦干、苦鑽、苦学、苦煉，做到又紅又專”的口号。在群众中出現了“人人当先鋒，个个保光荣”的口号。紅安县这个身經百战的老苏区，正在按着毛主席“发揚革命傳統，爭取更大光荣”的指示，以“苦战三年扭轉乾坤”的英雄气概，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紅安奋勇前进。

我們知道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不平衡的，先进和落后的区别是永远不会完全消灭的。紅安县在1957年就采取了抓重点、抓落后、抓新鮮事物的领导方法。对于落后乡、落后社、落后队、落后山、落后苗，采取了层层負責，一綫串珠的办法，促使落后赶上了先进，实现了社社增产和全县增产。最近他們除了向外地学习先进經驗和总结推广本地先进經驗之外，又在全县开展了一次群众性的檢查評比，由县委負責干部分四片分別帶領乡、社干部兩千余人参加，进行了互相檢查，互相評比，表揚了先进，推动了落后。以县委第一書記程鵬同志为首組織了一个流动办公室，他們帶着电话机和农具，走到那里在那里联系，发现問題就地解决；走到那里在那里参加生产。如果发现和研究了具有全县意义的问题，就地召开現場會議，或者利用有线广播組織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收听广播